

中国民俗体育研究进展述评(1997—2014)

向军^{1,2}, 郭惠杰¹, 刘小明², 方千华¹

(1.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 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为了解民俗体育研究的现状和探寻其未来走向。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民俗体育研究的视角、问题、理论和方法进行述评。结果表明:民俗体育研究主要运用研究尺度、研究路径和理论工具三类视角;民俗体育研究集中在民俗体育概念、现状调查和功能与价值等问题;民俗体育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和民俗学理论;民俗体育的研究方法主要处在研究方式和具体技术层面。提出民俗体育要加强其学理和推进民俗体育的现代转型等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民俗体育;体育文化;综述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5)04-0001-07

Review of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Folk Sports(1997—2014)

XIANG Jun^{1,2}, GUO Hui-jie¹, LIU Xiao-ming², FANG Qian-hua¹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folk sports and explore its tren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review researchful views, issue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folk sports. The result shows the views that folk sports mainly uses are resourceful scale, approaches and theoretical tools. The issues that folk sports focus on are the concept, investigation and the function and value. The theory that folk sports uses are sociology, culture and folklore. The methods that the folk sports uses are on the level of research method and concrete technology. The folk sports should strengthen study of its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promot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end.

Key words:folk sports; sports culture; review

民俗体育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有学者指出:重视“民”和“俗”的问题,是在重视共同体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1]所以,民俗体育作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民主政治、民主社会的发展将会受到应有的重视。最早使用“民俗体育”的研究始于1997年。^[2]进入21世纪,不少学者加强了对民俗体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民俗体育”这一概念在体育学术期刊上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一方面,民俗体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在不断深入、完善;另一方面,对各种民俗体育项目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综而观之,研究无非涉及视角、问题、理论和方法这四个基本方面。基于此,对于民俗体育现有文献的评述也将从这四方面进行,期望可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和审视,也可对未来的研宄提供参考。

1 民俗体育研究的视角

研究视角即研究者看问题的视角,即“研究者看待研究问题的角度以及对研究问题的有关看法”。^[3]在民俗体育文献中可以看到,常使用的研究视角有三类:研究尺度、研究路径、理论工具。第一,依研究尺度,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不同的研究尺度将解决不同的问题,宏观研究解决民俗体育系统、民俗体育多样性问题,中观研究解决区域或民族民俗体育特色问题,微观研究解决某地民俗或某项民俗体育的问题。按照以上研究尺度的说法,全国范围相对来说是宏观研究,省域或流域范围是中观研究,县域、乡村范围是微观研究。当然划分要看其涉及范围,再归入某个层次。比如客家民俗体育研究,由于涉及多个

省份都有客家,所以应归入宏观研究层次。又比如汉水流域、鄱阳湖地区的民俗体育研究也应归入宏观层次。再比如民族来划分的,就要根据民族实际范围,来确定属于哪个层次的研究。

第二,从研究路径来看,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三种研究路径。“自上而下”的研究通常是从国家、制度、权力等宏观的顶层的研究开始,然后落实到下面执行。“自下而上”则恰恰相反,一般从民间基层组织,如村落、协会、社区等角度开始,然后总结归纳,向上推演出一般规律。省域尺度的研究,甚至县域的研究,由于位于中观层次,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般都采取“上下结合”的研究路径。民俗体育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对象有两个重点:一是以一个基层单位的民俗体育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二是以某个民俗项目个案作为研究对象。“上下结合”一般是中观层次的研究,具有中介性和双重性的特点。中介性是指既要对某个单位和某个事件进行经验分析,又要注重理论支撑,但以经验实践为主。双重性是指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理论和微观素材相结合,既能摆脱工作的经验和局部狭隘性的束缚,又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般尺度。这类研究不像宏观研究那样理论抽象化,也不像微观研究那样细致入微。

第三,从运用的理论工具看,多运用社会学理论、文化学理论、民俗学理论、管理学理论的视角。由于民俗体育就是俗民生活,而俗民生活涉及多方面,那么就需要用多学科视角进行观察和审视。

在具体的研究中,各研究角度可以融合使用。回顾当前民俗体育各视角的研究,发现有几个特点:第一,民俗体育在三个尺度上的研究,数量旗鼓相当,但大都微观解读不足,对策乏力。虽然有些研究成果立意于微观,但研究多是某项民俗体育历史的起源、现状、文化特点、价值的探讨,仅停留在现有的、表面的调查研究,未能从民俗体育内部运行机制深度解读民俗体育微观图景。第二,民俗体育的个案研究较多,也就是“自下”的研究较多,但“而上”的研究较粗糙,也比较牵强。卡尔·波普尔曾指出: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不论多少次证实都可以被一次证伪所推翻。所以,从个案研究推出一般结论或通过个案研究证明某种理论都需要细心求证,不要过度延伸。第三,农村、乡镇、较大区域的民俗研究较多,县级区域民俗研究不多。县级政府是基层组织的最高单位,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民俗体育应多加强基层各层级民俗体育互动的研究,更好地、整体地把握基层民俗体育运行机

理。第四,民俗体育研究主体依然是体育学者,而目前民俗体育的运行和研究实际上有多方面的参与,如文化部门、旅游部门、教育部门、传承人等,所以民俗体育研究主体应该扩大,体育研究者应主动联合或参与到其中去,既可避免重复研究,又可感受到多学科、多视角的认识,避免体育自身的学科限制,同时也可了解其他部门研究者的困惑。第五,民俗体育通常是民俗的主体内容,却忽略了其他民俗项目的价值。附属的民俗项目,虽然不是主体,但不可忽视。只有从整体看,民俗才完整。

2 民俗体育研究的问题

2.1 民俗体育概念及其归属

《体育科学词典》把民俗体育定义为“在民间风俗或民间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涂传飞认为,按照民间体育是否具有传统性的特点,可把它分为传统体育和非传统体育,传统体育又可分为民俗体育和民族体育^[4]。民俗体育是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的一种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化、仪式化的传统体育文化,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王俊奇认为“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基本是指同一个含义^[5]。“民俗”即研究民间的俗事(又称“事象”),并建议把“民间体育”统一称为“民俗体育”,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部分。其后,王俊奇认为民间体育与民俗体育不同,民间体育不具有世代相传和延续的特点,而民俗体育是一种世代传承和延续的体育文化形态^[6]。陈红新等认为民间体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宽广的概念,涵盖民俗体育,民族体育分为传统体育和非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是传统体育的分支^[7]。综观三者的定义,不难看到,都认为民俗体育的词义重心是落在民俗而非体育,从这点来说,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体育民俗”。

从直观上,涂传飞对民俗体育概念的归属分类较为完整。王俊奇的分类层次只有两层,民俗体育的共性和个性不易体现。陈红新的分类层次较多。从逻辑来看,涂、陈两学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分类的标准不一样,涂传飞在第二层是按照传统性进行分类,分为传统性和非传统性。而陈红新是按照民族性来分。问题是民族性怎么分?有没有非民族性的体育?该作者强调“民族体育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独有的”,

那就可推断其非民族体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共有的体育。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共有的体育就会与传统体育相交叉。可见,这种分类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涂传飞第二层次用非传统体育能较好地包括其他体育,而又不与民族体育和民俗体育交叉,这种分类的民族体育与民俗体育的交叉也很多。如很多民族体育就是民俗体育,如壮族的抢花炮、苗族的抢狮、纳西族的东巴跳等。但这是最后一层的分类,不影响前面的归属矛盾。

2.2 民俗体育的现状研究

现状研究是了解民俗体育运行状态的基础,也是政府制定民俗体育政策的现实依据。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自然环境差异大、文化差异大,造就了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因此,具有鲜明区域性特色的民俗体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如《湘西民俗体育渊源、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8]《四川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研究——以民间传统舞蹈为例》^[9]《客家民俗体育的实证研究》^[10];也有以某个民俗体育的个案研究,如《我国民俗体育的流变——以龙舟竞渡为例》^[11]《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流变——以江西永新盾牌舞为例》^[12]《鄂西土家族舍米湖村摆手舞田野调查——兼议民俗体育在村寨人社会化中的社会功能》^[13]。也有对某个民族的民俗体育的研究,如《试论湘鄂赣黔边区土家族民间体育的起源与发展》^[14]。在这些局部研究的基础上,也有学者们对民俗体育现状进行整体上的思考,如《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研究》^[15]《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16]等。

从现状研究看,都强调对具体民俗体育现象形式、要素的研究。最近有学者指出民俗体育更应对俗民或俗民组织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研究既“见事又见人”,还要研究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信仰、传说、习惯等,从俗民生活的角度全面了解民俗体育。因此,没有全面了解参与民俗体育的人的活动和意义,就无法全面深入理解民俗体育的意义。

2.3 民俗体育的结构、功能和价值的研究

结构、功能和价值关系密切。系统论原理揭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辩证统一。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属性,结构不同功能也不同,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事物固有的、客观的属性,而价值是外部赋予的、主观的。根据功能进行价值取向就形成各种目标。目前,把民俗体育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其功能的研究还很少,主要研究者是刘旻航及其团队,

并得到了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是“我国民俗体育的现代功能及社会文化价值研究”。刘旻航^[17]对民俗体育功能分类进行了研究,认为民俗体育功能主要分为两大类:应然性功能、实然性功能。认为应然功能是指民俗体育自然所具备的功能,主要包括促进身心健康、教育、娱乐、维系这四个功能,这些功能的彰显就是其显性功能。民俗体育的实然功能是指在实践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实然功能是隐性功能。并认为民俗体育的实然功能自然包括民俗体育的应然功能,理论上民俗体育的应然功能和实然功能应该完全相等,但事实上这两个功能系统并不完全相等,现实中的实际功能显然比应然功能内容要丰富得多。虽然这种功能划分让大家看到了民俗体育的不同功能及其特点,有利于深化对民俗体育功能的认识。但是,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实然和应然的解释与刘旻航的有出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8]主观上的存在即应然存在,客观上的即为实然存在。人存在于这两种存在的否定性统一之中。而刘旻航认为应然功能是自然所具备的,显然与马克思的主观上存在不符,反而与客观上的自然无机条件的存在符合,所以,该作者显然是把两个概念解释反了。应然功能是主观存在的,是人所特有的功能,而实然功能是人自然存在的。两者的关系不是包含或包含于的关系,也不是对等的关系,人的实然的存在是应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没有实然的存在就是无本之木,但应然的存在又会超越实然的存在,两者统一于人的实践中。民俗体育是人的民俗体育,自然也有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功能。民俗体育的实然性功能有传播乡土知识或技能的功能、规范功能、社群组织功能,反映社会风俗习惯的功能等,应然功能有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功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促进社会活力的功能等。

李树梅、刘旻航运用民俗学理论从语境构成角度对民俗体育运行结构进行了研究,把其运行结构分为生态子空间和气质子空间,生态子空间又由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具体情境组成,气质子空间由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构成^[19]。民俗体育结构是社会结构的缩影,因此可以用社会学的理论进行解释。吉登斯指出,结构具有二重性^[20],即社会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

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时空之中的社会实践。民俗体育的俗民行动也受到民俗体育结构的制约,同时也以行动改变着结构,推动民俗体育结构的变迁,并改变其功能。笔者认为,民俗体育结构的研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还可进一步扩展研究范围,如可对民俗体育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民俗体育行为与民俗体育结构的辩证关系进行研究。

民俗体育的功能是其价值实现的内在因素。只有当民俗体育的某一功能与人们的需求发生联系,并得到认同后,其功能才纳入人的需要过程,其功能才进入价值化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需要,民俗体育的价值重新得到显现和扩展。李军对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庆中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进行研究,认为节庆中的民俗体育有表征节日文化、彰显民族文化内涵、民族体育延续的载体、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体现民族文化认同等价值^[21]。卢玉等对许村大刀舞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进行研究,认为大刀舞具有独特的文化传承价值、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独特的文化开发价值、独特的文化教育价值^[22]。周传志认为闽台民俗有传承文化、促进经济、健身与娱乐、教育等现代价值^[23]。民俗体育的价值一般是指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对民俗体育整理和相应改造,其价值实现和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郭修金认为民俗体育赛事具有促进乡镇、街道社区和谐发展的作用^[24]。王敬浩认为民俗体育对身体和谐有建构作用^[25]。

3 民俗体育研究中的理论应用

理论向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般框架,同时,它指导着人们去探索具体的事件^[26]。就民俗体育研究而言,自身理论建设还处于理论引进阶段,学科理论基础还很薄弱。在民俗体育研究中,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领域的理论应用最多,诸如社会转型和变迁理论、宗教社会学、社会再生产机制理论、礼物交换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

社会转型期间,在西方现代体育发展模式、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环境下,民俗体育的生存空间面临挑战。出现的问题主要有:民俗体育的组织变松散、民俗体育的传承人缺乏、民俗气氛变淡、民俗形式变简单、民俗体育被现代体育与流行的新媒体挤占等。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以社会学理论来解读民

俗体育的发展和变迁。如郑国华以社会失范理论为切入点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进行了研究^[27]。

许多民俗体育的起源与宗教信仰密切有关,虽然科学在广泛领域影响社会文化,但宗教信仰仍在民俗体育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王俊奇认为江西民俗体育中的舞龙、赛龙舟和傩舞与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28]。除了较早从宗教角度探讨民俗体育源起的研究外,后继的民俗体育研究者主要目的是透过宗教现象去发现人类社会及精神发展的规律、规范体系及象征符号的建构原理^[29]。陈强等从原始宗教的视角对水族民族体育文化进行研究,认为信仰原始宗教荔波水族,其民俗文化、民族体育文化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原始淳朴的信仰使其观念、思想、民俗文化独具特色^[30]。

民俗体育不是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它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由于西方体育模式的渗入,民俗体育生存环境变化使民俗体育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民俗变成了体育项目,社会建设功能逐渐减弱和被忽视。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农村等欠发达地方的社会建设进入政府议程,而农村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没有充分的经济能力去带动社会建设。因此重新恢复民俗体育,让其发挥社会再生产的作用非常必要。涂传飞运用社会再生产机制理论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进行了多方面解读,并提出了民俗体育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指出了民俗体育发展要依托民俗文化母体,保留民俗体育核心形式和核心作用,并对民俗体育中一些不合时宜的作用和功能进行调整和转换^[31]。

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对解读我国民俗体育研究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冯强等运用礼物交换理论反思民俗体育研究和发展,认为民俗体育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总体呈献体系,指出运用礼物交换理论可以呈现民俗体育的“总体性社会事实”,民俗体育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在新时代重构其“意义结构”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32]。

2005 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要求要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由于很多民俗体育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民俗体育成为另一热点。钟元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出发探索广西宾阳炮龙节的起源,对其蕴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价值以及保护与传承的意义等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并对其发展现状和在发展过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和阐述^[33]。牛芳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

徽州民俗体育传承特性、传承危机及保护现状进行研究^[34]。虽然对民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也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地方,如过度商业化对一些民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生命力的破坏,造成这些民俗体育项目自组织能力的丧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等级系统,有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和世界级之分,并有相应的传承人体系。这种等级鲜明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体系是否会给人一种文化优劣感呢?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有不同等级?这些现象都值得反思。

民俗体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把民俗体育放在文化的视角进行考察有其独特的作用。当前,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许多民俗体育被边缘化甚至消失,但也有许多民俗体育仍然顽强的生存了下来。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等文化视角给民俗体育的研究带来新的气息。张基振对潍坊风筝做了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潍坊风筝文化历史脉络全面客观的描述,解释了其文化存在的土壤、传承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环境对其传承发展所带来的正负影响,以及如何形成风筝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35]。丁怀民提出要从静态文化保护转向动态的生态开发,加强立法,建立民间体育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发展策略^[36]。

总之,某种理论的应用无论挖掘多深,都只是一种视角、一种解释框架,除自身视角的局限性外,理论解释力度可能随时代的变迁会减弱。比如,礼物交换理论给民俗体育的历史研究和现代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完善了人们对民俗体育意义的理解,但是否能将当今民俗体育表演这种礼物交换视为一种总体呈献体系呢?礼物提倡礼尚往来,平等交流,中间没有发生增值,但却互相加强了感情交流。民俗体育表演以往主要是内演,表演者自身享受着,与其他观看的享受者之间是平等交换,没有产生增值,而现在的主要形式是外演,表演是给观众表演,表演是为了增值,如果达不到表演者的增值要求,就不会再去表演。所以,当今民俗体育外演这种礼物非以前内演之礼物,是一种有条件的总体呈现体系,所以,其理论解释力度也将受到影响。因此,除了引进某种理论进行研究外,民俗体育的研究也应坚持一种“系统”的研究理念,即应摒弃零碎的、跟风式的研究而从整体上来把握。另外,以往的研究运用民俗学本身的理论较少,反而其他学科理论成为民俗体育研究的主要理论。民俗学家乌丙安指出:“民俗学的着眼点和研究角

度,或叫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就应该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有重要的区别,形成自身的学科特点。”^[37]从目前的民俗体育概念研究文献来看,对民俗体育的属性仍认为是民俗,所以民俗体育研究理应以民俗学理论应用为主。

4 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包括方法的特点、理论基础、操作程序、具体手段、作用范围等方面。一般来说,研究方法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1)方法论,即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2)研究方法或方式,即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3)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即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38]。

综观当前民俗体育研究成果,所采用的研究基本方式主要有:实地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技术主要有:观察法、访问法、问卷法、定性资料分析法、质性研究法、统计分析方法等。目前,民俗体育的研究方法主要处在研究方式和具体技术层面,较少对其方法论进行反思。

实地研究在民俗体育研究中使用较多,也产生了不少民俗体育实证的优秀研究成果。实地研究法通常运用参与观察和个案研究两种具体方法进行研究,通过无结构的观察和无结构的访谈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其研究过程凸显研究过程的特殊性、深入性、主观性,在研究思路和策略上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体验和感悟,方法上更多地依靠研究者的参与和对情景的分析。^[3]如李志清以桂北村落社区的抢花炮为案例,通过实地深入观察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实地研究是一种质的研究,对民俗体育的微观研究,一般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现象之中,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研究结果或理论。目前质的研究也形成了几种模式,发展出了建构主义模式、批判理论模式、各种互动模式。陈向明指出:传统的研究设计模式通常采用线性的结构,按照一定的前后步骤逐步地进行研究。而质的研究者认为研究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循环往返、不断演进的过程。^[26]民俗体育的研究通常涉及很多方

面,各部分的关系复杂多变,研究者也可根据实际的需要利用这几种模式进行研究。

调查研究在民俗体育研究中也广泛使用,主要有普遍调查和抽样调查两种类型。民俗体育中主要使用抽样调查法,该方法通过统计报表、自填式问卷、结构式或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文献研究法使用频率较高是因为该方法不需要进行艰苦的实地调查,通过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就能对一些民俗体育的起源、发展变迁、文化价值进行理论研究。如吕利平的“从体育考古看我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特征”^[39]一文就是利用考古资料和文化史料进行研究。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在于文献资料的全面占有,各种资料相互印证,从而达到一个合理、准确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

概而言之,就民俗体育研究而言,如果想对民俗体育的起源、历史发展进行了解,就可利用文献资料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如果想对民俗体育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如民俗体育的种类、参与人群、场地器材、经费等,那么利用问卷调查就可获取相关数据,就能对民俗体育的一些表层现象进行较全面的呈现。但是,要对民俗体育主体的思维方式、意义理解、利益博弈以及运行机制研究,仅仅通过表层的一些现象的调查和文献调研是不够的。事实上,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非常复杂,涉及地方风俗、民间信仰、神话传说、乡规民约以及民族艺术等多个方面。那么民俗体育的意义也只能在这些方面以及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得以表现。

随着民俗体育研究的深入,对研究的方法论开始反思。王若光^[40]首次对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认为民俗体育的概念是方法论的起点,起点成“一体两翼”模型,“依附于母体文化且延续至今的……”核心主体,“历史上繁荣且已经消失的……”与“现今存在但脱离母体文化的……”是“历史侧翼”和“分化侧翼”。作者还探讨了民俗体育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两对方法论,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可在质的分析中融合统一,实现民俗体育研究的“二元互补”;认为民俗体育的“个别事象”和“集体文化”之间是不断互动螺旋循环。最后,作者分别对民俗体育研究的意义和实践两种取向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其实,研究方法不存在“对”与“不对”“好”与“不好”之分,能否有效分析与解决研究的问题,才能衡量其是否合适。当确定研究计划时,需要根据问题

的性质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比如想要研究民俗体育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法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对于大多数民俗体育研究来说,运用实验法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质性研究对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推论虽不严谨,但是它可以就研究对象提供丰富的描述。

5 结语与展望

本文从视角、问题、理论与方法四个方面对民俗体育近 15 年的主要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审视。就视角而言,主要从研究尺度、研究路径、研究理论三方面进行探讨;就问题而言,主要从概念、现状、结构、功能和价值进行探讨;就理论而言,对一些民俗体育研究主要应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理论;就方法而言,就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论、方式、方法三个层面进行了探讨。综合已有的研究和反思,今后民俗体育研究还可以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关于民俗体育研究走向,马克思一句名言可以给民俗体育研究作哲学指导:“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41]。他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性哲学,另一类是实践性哲学,而且认为更重要的是后者。因此,笔者认为民俗体育研究走向要建立在现代性上,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努力构建解释当代问题的有效解释系统,并积极为现代生活、文化、社会等实践服务。其次,在民俗体育研究方法论上,民俗体育研究者要围绕民俗体育的重要问题,运用多种视角,采用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加强这四者的相互协同关系去综合研究。除加强实证研究外,还要加强民俗体育的学理研究。第三,在民俗体育实践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强民俗体育的城乡统筹协调的研究,加强县域层次的民俗体育整合研究,这些研究将积极推进民俗体育的现代转型以及城乡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 [1] 高丙中.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 [2] 郭晓峰. 试论民俗体育与全民健身 [J]. 辽宁体育科技, 1997(6): 33-37.
- [3]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68-72, 129.
- [4] 涂传飞. 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概论再探讨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9, 43(11): 27-33.

- [5] 王俊奇. 关于民俗体育概念与研究存在的问题——兼论建立民俗体育学科必要性[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7, 24 (2): 16-20.
- [6] 王俊奇. 也论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概念及其关系——兼与涂传飞、陈红新等商榷[J]. 体育学刊, 2008, 15(9): 101-104.
- [7] 陈红新. 也谈民间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民俗体育概念及其关系[J]. 体育学刊, 2008, 15(4): 8-11.
- [8] 蒋作文. 湘西民俗体育渊源、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9] 宋秀平. 四川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研究——以民间传统舞蹈为例[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7(7): 21-24.
- [10] 杨艳红. 客家民俗体育的实证研究——以闽西连城罗坊乡“走古事”活动为例[D]. 赣州:赣南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11] 胡娟. 我国民俗体育的流变——以龙舟竞渡为例[J]. 体育科学, 2008, 28(4): 84-96.
- [12] 郎勇春.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流变[J]. 体育学刊, 2009, 16(12): 96-100.
- [13] 李海清. 鄂西土家族舍米湖村摆手舞田野调查——兼论民俗体育在村寨人社会化的社会功能[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2, 46(11): 61-65.
- [14] 涂绍生. 试论湘鄂赣黔边区土家族民间体育的起源及发展[J]. 中国体育科技, 2001, 37(5): 4-6.
- [15] 张国栋. 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8, 28(1): 4-7.
- [16] 许明思. 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以徽州村落的“叠罗汉”为例[J]. 赤峰学院学报, 2012, 28(7): 118-119.
- [17] 刘昊航. 民俗体育功能分类及特点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2, 28(5): 37-42.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441.
- [19] 李树梅. 民俗体育生存空间架构中语境向量之归结[J]. 体育科研, 2013, 34(3): 76-79.
- [20]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李康,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8:89.
- [21] 李军.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庆中民俗体育的文化特征及价值[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7(1): 15-18.
- [22] 卢玉. 许村大刀舞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一项民俗体育的田野考察与文化解读[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 38(11): 79-83.
- [23] 周传志. 宗族社会视角下的闽台民俗体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 47(7): 12-15.
- [24] 郭修金. 民间体育赛事促进乡镇、街道社区和谐发展的实证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0, 34(6): 13-17.
- [25] 王敬浩. 民俗体育对身体和谐的建构[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8, 42(10): 15-19.
- [26]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1, 31.
- [27] 郑国华.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11, 47(3): 70-78.
- [28] 王俊奇. 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宗教文化因素[J]. 体育学刊, 2004, 11(2): 72-74.
- [29] 王建新, 刘昭瑞. 地域社会与信仰习俗——立足田野的人类学研究[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2.
- [30] 陈强, 姚春柳. 原始宗教下荔波水族民俗体育文化探析[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19-22.
- [31] 涂传飞. 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的人类学阐释——来自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民族志报告[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6(1): 19-23.
- [32] 冯强. 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对民俗体育的启示[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2, 46(6): 15-19.
- [33] 钟元博.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以广西宾阳炮龙节为例[D]. 南宁: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34] 牛芳.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徽州民俗体育的传承——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例[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8(3): 58-61.
- [35] 张基振. 文化视野中民间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以潍坊风筝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D]. 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36] 丁怀民.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保护[J]. 吉首大学学报, 2010, 31(3): 109-111.
- [37] 乌丙安. 民俗学原理[M].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4:9.
- [38] 袁方.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
- [39] 吕利平. 从体育考古看我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特征[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0, 26(4): 12-15.
- [40] 王若光. 民俗体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3, 28(3): 224-228.
- [41] 谭培文.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41.

[责任编辑 江国平]